

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与审计师选择

张振波

(南京审计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 数字化转型往往难以一蹴而就, 部分企业可能采取数字化粉饰策略以实现低成本的声誉建构和形象管理。基于 2008—2021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 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粉饰策略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 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与高质量审计师选择呈显著负向关系, 且这一影响具有长期效应; 机制检验表明, 在选聘审计师时通过向下匹配机制从而获得审计意见的正向偏离, 是在数字化转型中采取粉饰策略的公司倾向于聘用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动机; 异质性分析发现, 数字化粉饰策略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行业竞争程度更高以及所在地被列入“智慧城市”试点的企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实质性转型; 形式性转型; 数字信息披露; 形象管理; 数字化粉饰; 审计师选择; 审计意见; 审计意见激进度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4)06-0032-0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数字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和目标规划, 引导和支持各类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 2020 年 8 月, 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 明确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方向、重点和举措; 2022 年 11 月 3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 从转型引导、资金支持、试点应用及配套服务等方面多措并举激励和推动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与各类政策要求和转型指南相配套, 各级政府为激励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开展了各项政策支持与补贴举措^[1]。对于企业经营而言, 政策支持与政府补贴是一种重要的稀缺性、排他性资源, 对于消弭市场歧视、改善融资环境、助推研发创新、提升财务状况和风险承担水平等具有关键作用。企业会为此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1]、建立政企关系^[2]、配合实现政府政策目标^[3], 甚至会采取一些过度宣传和“漂洗”策略以改善自身形象、获得政府青睐^[1,4]。当然, 虽然政府政策支持为企业转向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外生动力, 但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 面临从技术应用到业务创新、从组织变革到文化重塑、从数字化能力建设到人才培养等多方面挑战, 难以一蹴而就^①。更何况推进数字化转型往往需要系统性和持续性的企业投入, 而在此过程中所进行的产业升级、业务调整与流程重组也会使企业面临更加复杂的经营管理情境, 进而导致更多的内外部监督“盲点”^[5-6]。因此, 企业可能采取多种策略性、权宜性的数字化转型及信息披露手段来应对政策要求, 以获得更多优惠^[7]。本文关注的数字化粉饰指的是企业在推进和宣介数字化转型时说得多但做得少, 反映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 将数字化粉饰视作为一种低成本的声誉建构机制和资源获取策略。

外部审计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职责是对公司财务报表、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进行独立、专业的审查与鉴证^[8]。审计师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越强, 越会对企业披露的财务与非财务信息进行高质量鉴证, 从而提升企业数字化粉饰行为被揭露的潜在风险。然而当前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影响的研究仍然较为匮乏^[9], 仅有部分研究关注企业实施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实质性数字化项目对审计师选择策略^[6]、审计师定价^[7,10]与出具审计意见类型^[9]的影响, 但尚未有研究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采取的粉饰策略对审计师选

[收稿日期] 2023-12-2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404136、72174136); 江苏省青蓝工程(2022)

[作者简介] 张振波(1990—), 男, 山东滨州人, 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从事公共政策与公司治理研究, E-mail: zhang-zb2024@163.com。

^①例如,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 已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上市公司中, 相对成熟或转型已完成公司数量占比分别为 8.7% 和 0.2%, 大多数还处于探索阶段。

择的影响。本文以2008—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综合考虑“言”和“行”两个维度以测度企业数字化粉饰(即“多言寡行”)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边际创新体现在:第一,深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分析与认识。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一种机会主义策略,粉饰策略目标在于以低成本的形象管理和声誉建构机制来塑造数字化形象、获取政府政策支持,故而影响政府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资源配置精准度,不利于数字化建设进程的全面推进。目前鲜有文献对这一现象展开深入研究,本文为客观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开辟了研究路径。第二,企业在不同场景下、基于差异化需求,可能有不同的审计需求并呈现出不同的审计师选择策略,本研究不同于公司规模、产权性质、企业治理、政治关联及企业文化等传统分析视角,而是分析了数字化粉饰策略的影响机制,从而丰富了企业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三,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在现阶段推进数字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数据资产资源信息披露规范制度建设的相对不足,为监管部门加紧制定针对性政策指南、实质性推进全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普遍论述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有研究指出数字化技术不仅能够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与投资价值、创造新的经济业态和市场机会^[5],而且可以推动企业在智能生产与制造、数字渠道和营销上优化业务流程,从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9],打破组织边界和部门壁垒,降低部门协作与跨界经营的合作成本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11]。此外,也有研究认为在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通过智能财务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机制的应用,能够降低财务风险,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从而缓释代理成本^[12]。然而,关于如何测度和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目前学界却尚未形成统一规范操作定义。当前较为主流的操作方法是采取内容分析法,通过企业年报中的关键词文本分析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刻画^[13-14],而另有做法则基于数字经济相关无形资产等财务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衡量^[10,15]。如果说后一种方法从“行”的维度体现了企业在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方面的创新产出与实际投入,那么前者则从“言”的角度捕捉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信息披露情况。

企业信息披露虽然以合规性为基本原则,但始终有选择性披露正面信息的倾向,即所谓的策略性信息披露。现有研究对企业通过年报文本进行策略性信息披露的动机大多基于信号传递和印象管理两种理论展开分析:信号传递理论认为企业会通过年报文本向外部传递企业内部增量信息以彰显企业能力、提升市场形象从而获取利益相关者青睐^[16];印象管理理论则认为管理层甚至可能通过文本操纵、粉饰甚至扭曲真实信息,改变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的印象,提升其对企业发展前景的判断^[17]。加之现阶段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的相关准则规范尚未完善^[7],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惩罚力度较低^[18],当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包装粉饰和声誉建构的印象管理行为^[7]。正如有研究发现,自愿性披露具有较强的“自我服务”意图^[19]。数字化转型信息作为一种自愿披露性信息,可能被上市公司操纵,成为塑造自身形象、争取政府补贴与政策支持,从而以较低成本谋取机会主义收益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说,分析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言”“行”差异、认识企业数字化潜在的粉饰策略,可以更为准确地检验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以及对外部审计师选择的真实影响。

基于公司治理理论视角的外部审计师选择动机研究一般将高质量审计师视作缓解公司代理冲突、制约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外部监督力量(即代理理论^[20]),认为其能够提升公司会计信息含量、降低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信息理论^[21]),并且能够对外传递公司经营状况稳健、发展前景良好的信号(即信号理论^[16])。总的来说,审计师选择综合体现了企业对审计投入与服务回馈之间关系的权衡结果,与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管理层策略、审计师规模等因素密切相关^[22]。公司既可能聘请高质量审计师以缓解代理冲突、提升信息质量并传递市场信号,也可能出于降低审计收费的目的隐藏机会主义行为甚至进行合谋以实现审计意见购买,从而选择小规模、低质量的事务所进行审计^[22-23]。然而,当前尚未有研究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潜在粉饰策略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不同于既有相关文献仅基于年报文本或财务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单一刻画和测量,本研究将企业数字化转型“言”“行”两方面表现结合,综合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潜在粉饰策略,并将其作为一种策略性信息披露手段或一种机会主义经营行为来分析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本研究将丰富和充实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其审计影响的相关文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尽管各界普遍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增强企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必然方向和关键路径,但仍要看到,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和长期性工程,不仅需要以长期和多方面的资源投入作为支撑和保障^[5],而且数字化转型会倒逼企业组织管理与业务经营机制的重塑与再造,其过程往往伴随新的不确定性。这既是因为在数字化赋能新组织和业务模式的过程中,管理制度调和、组织结构转换、员工适应学习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认知认可与接受情况等往往难以预测,且转型过程中企业管理层对产品和服务更新也经常缺乏准确的认知和分析。新的不确定性带来更大的经营和管理风险,甚至导致企业股东对管理层决策管理能力产生误判和不信任,进而造成新的代理问题^[9]。因此,当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诸方面条件不成熟时,其可能采取诸种策略性、机会主义的数字化转型及信息披露手段^[7],以获取政府的针对性政策支持与政府补贴。

可见,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应从实质和形式两方面进行评估:实质转型是指企业在业务数据化和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应用上所付诸的行动实践,以及在组织、业务、市场、产品开发、供应链、制造等多方面经济要素上的变革推动,具体体现为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投资、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的再造、专业人才队伍的配备等。形式转型则是指企业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和必要性,但却多停留于文本表达、语言表述或媒介宣传的“口惠”层面,行动之“实”则大多不至,具体体现为年度报告中“战略规划多”,而实践中“行动投入过少”。当企业形式主义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大于实质转型程度,则可认为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多言寡行”的数字化粉饰策略行为。根据企业经营战略与治理需求,不同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可能会倾向于选择不同的外部审计师。

一方面,实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因其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经营绩效、降低财务风险、增强信息透明度和信息对称性^[5,12],且可以提高审计效率、节约审计成本^[9],从而能够改善审计师对企业的风险判断、获得更为稳健和积极的审计意见。而且,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卓有成效的数字化转型本身彰显了其稳健良好的财务状况、忠诚及时的政策响应和积极全面的社会责任履行,因此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市场声誉和业界知名度更高的审计师,以将自己与其他企业区分开、向市场传递“高素质”信号^[6,24]。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更大的经营不确定性,往往需要高质量审计师以替代公司内部治理的相对不足,揭露经营与财务管理中的潜在问题,甚至降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异常增加的代理成本^[9]或潜在的盈余管理空间^[5]。当然,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也会因数据过量且复杂、业务范围与经营流程多样和充满不确定性而提高审计业务难度、导致审计师收取更多费用^[18,25-26],但在数字化转型取得切实成效的情况下,为高质量审计服务支付的更高溢价将从政府补贴、政策支持、形象改善及融资成本下降等潜在收益中得到弥补^[8]。

另一方面,对于数字化转型更多停留于形式层面、采取粉饰策略的企业而言,选聘具有更高独立性和声誉保护机制、能够约束机会主义与审计合谋行为的审计师,则意味着其数字化粉饰行为面临更高的揭露风险,审计师也更可能因此而出具低质量的审计意见^[27]。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会综合衡量操纵信息的风险和收益,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降低信息操纵被识别的潜在风险损失^[8]。对这类存在潜在虚假信息披露的公司而言,雇佣高质量审计师增加了其信息操纵行为被揭露的风险。已有研究发现虚假信息披露公司被揭露后可能因此而面临大客户产品需求降低^[28]、债务融资成本增加^[29]、股票市场价值下跌^[30]以及被纳入政府监管“重点名单”^[18]等多方面声誉制裁。与之不同,相比国际“四大”等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本地小所在审计服务质量控制上易受外部影响,更具机会主义行为取向,甚至可能与企业客户达成合谋并提供非匹配的审计意见^[31],这将使企业因信息操纵而带来的潜在声誉损失风险得以控制^[32]。另外,由于该类企业缺乏数字化转型的实质行动,为避免社会媒体、政府部门的过度关注^[17],也缺乏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传递优质企业信号的需求和动机。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

H: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与高质量审计师的选聘负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 2008—2021 年的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金融类企业、ST 类公司和财务数据缺失较为

严重的样本,最后得到 19610 个样本观测值。企业数字化粉饰(即“多言寡行”)水平基于年报中数字化文本词频占比(“言”)和数字化无形资产占比(“行”)计算得到,企业数据和审计师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为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本研究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参考审计师选择相关研究^[8,31,33],本文构建 Logistic 回归模型(1):

$$Auditor = \alpha_0 + \alpha_1 Digit_{wash} + \alpha_2 Controls + Year + Industry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审计师选择(Auditor),参考相关文献^[6,34],国际“四大”有着更为严格的监督或质量控制系统和被市场普遍认可的审计报告权威性,因此可作为高质量审计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中根据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师是否属于国际“四大”对 Auditor 变量进行 0-1 赋值;在稳健性检验中,则同时将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作为高质量审计师。

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粉饰水平(Digit_Wash)。根据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中的具体行为与实际表现,从“言”和“行”两个维度来衡量上市公司的数字化粉饰水平。具体来说: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语言表现(Digit_Oral),参考高翀等^[9]、吴非等^[13]和袁淳等^[14]的做法,采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数字化相关的关键词词频数总和占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语段长度的比例来衡量;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行动表现(Digit_Actual),参考刘斌和汪川琳^[6]、张永坤等^[10]和高雨辰等^[15]的做法,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披露的无形资产明细中与企业数字化相关部分占资产比例来衡量。由于数字化粉饰是相对于同行业其他企业而言的,因此本文借鉴 Zhang^[35]和 Hu 等^[36]对于企业粉饰水平的测量方法构建模型(2)。

$$Digit_Wash = \left(\frac{Digit_Oral - \overline{Digit_Oral}}{\sigma_{Digit_Oral}} \right) - \left(\frac{Digit_Actual - \overline{Digit_Actual}}{\sigma_{Digit_Actual}} \right) \quad (2)$$

其中, $\overline{Digit_Oral}$ 和 σ_{Digit_Oral} 分别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语言表现的行业均值和标准差, $\overline{Digit_Actual}$ 和 σ_{Digit_Actual} 则为数字化转型行动表现的行业均值和标准差。这一操作方式也使得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言”与“行”得以直观比较,数字化粉饰程度得以直接测算。本文通过观察变量 Digit_Wash 系数 α_1 的显著性及其方向来判断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对其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参考陈小运等^[8]、高翀等^[9]、董雪雁等^[33]和马勇等^[31]的研究,本文控制变量群组 Controls 包括公司规模(Size)、上市时间(List)、上市平台(Platform)、资产收益率(ROA)、总资产周转率(Aturn)、资产负债率(Leverage)、股权集中度(FSR)、产权性质(Ownership)、上期审计意见(Opinion)以及上期审计费用(Fee)等。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审计师选择	Auditor	当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属于国际“四大”则为 1, 否则为 0
实质性数字化转型	Digit_Actual	数字经济相关无形资产占年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形式性数字化转型	Digit_Oral	年报中数字经济相关词频占年报 MD&A 语段长度的比例
数字化粉饰水平	Digit_Wash	基于数字经济无形资产占比和词频比例的手工计算得到
公司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上市时间	List	当前年份 - 公司首次上市年份
上市平台	Platform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则为 1, 否则为 0
资产收益率	ROA	年末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总资产周转率	Aturn	销售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资产负债率	Leverage	年末负债/平均资产总额
股权集中度	FSR	年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数
产权性质	Ownership	若公司是国有控股, 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上期审计意见	Opinion	若上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为 1, 否则为 0
上期审计费用	Fee	上期企业实际发生的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S. D.	Min.	Max.
Auditor	19610	0.082	0.274	0.000	1.000
Digit_Actual	19610	0.054	0.078	0.001	0.938
Digit_Oral	19610	0.007	0.009	0.000	0.147
Digit_Wash	19610	0.009	1.454	-15.062	10.389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可见,研究样本中有 8.2% 的上市公司聘请国际四大进行审计,且样本公司之间数字化转型推进程度差异较大,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倾向于进行策略化的信息披露并采取数字化粉饰行为,这为后文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

(二)基本回归结果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言”“行”表现及“多言寡行”的粉饰策略对审计师选择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第(1)列

至第(3)列所示。列(1)和列(2)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行动变量(*Digit_Actual*)的系数为 2.541 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企业数字化语言变量(*Digit_Oral*)的系数则为 -7.745 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相比年报文本数字化相关表述更多的公司,实质性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上市公司更会选择国际“四大”审计师。这一结果与刘斌和汪川琳^[6]、陈小运等^[8]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公司倾向于选择更高质量的审计师。列(3)为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Digit_Wash*)对审计师选择的回归结果,可见包装粉饰程度越高则越倾向于选择规模更小会计师事务所($\alpha_1 = -0.17, p < 0.01$),从而支持本文研究假设。

为观察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影响审计师选择的动态效应,本文将变量 *Digit_Wash* 分别滞后 1—3 期,回归结果如表 3 第(4)列至第(6)列所示。可见各滞后项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公司数字化粉饰水平与高质量审计师的负向关系具有长期性,从而进一步验证本文假设。上述结果表明,当年报文本或语调成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印象管理的一种手段时^[17],企业会选择规模较小审计师以降低数字化粉饰被揭露的可能性,进而控制潜在的声誉损失风险^[17]。

(三) 机制分析

为了进一步观察企业数字化粉饰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机制,本文借鉴董沛武等^[38]、陈娇娇和方红星^[32]的研究,构建测算客户与审计师关系匹配度的回归模型(3)。

$$Auditor = \alpha_0 + \alpha_1 Size + \alpha_2 ROA + \alpha_3 Leverage + \alpha_4 Aturn + Year + Industry + \varepsilon \quad (3)$$

基于模型估计系数与每个公司年度变量值可获取对于因变量的一个拟合值,即为该公司选聘国际“四大”事务所的估计概率;选择最佳临界概率以便使一类和二类错误的总和最小,如果客户选择国际“四大”事务所的估计概率在最佳临界值以上,则该客户被认为是潜在的“四大”事务所客户,反之则为潜在的非“四大”事务所客户。如果一个公司为潜在的“四大”事务所客户,但其选择了非“四大”审计师,则认为存在向下不匹配关系(*Mismatch_Down*);反之,如果潜在非四大事务所客户选择了四大审计师,则该公司存在向上不匹配关系(*Mismatch_Up*)。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对审计师选择错配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由列(1)至列(4)可知,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越明显,则其越会呈现审计师选择的向下不匹配关系,且这一关系随自变量滞后期数增加而愈发明显;列(5)至列(8)则显示上市公司数字化粉饰水平与向上不匹配关系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这一负向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可见,从长期来看,数字化粉饰行为将愈发打破客户与审计师的匹配性,进而影响审计市场

表 3 企业数字化粉饰对审计师选择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i>Auditor</i>	(2) <i>Auditor</i>	(3) <i>Auditor</i>	(4) <i>Auditor</i>	(5) <i>Auditor</i>	(6) <i>Auditor</i>
<i>Digit_Actual</i>	2.589*** (0.308)					
<i>Digit_Oral</i>		-8.077* (4.311)				
<i>Digit_Wash</i>			-0.170*** (0.023)			
L1. <i>Digit_Wash</i>				-0.171*** (0.024)		
L2. <i>Digit_Wash</i>					-0.159*** (0.025)	
L3. <i>Digit_Wash</i>						-0.157*** (0.025)
(LN.) <i>Size</i>	0.568*** (0.120)	0.553*** (0.120)	0.585*** (0.121)	0.690*** (0.137)	0.567*** (0.135)	0.495*** (0.136)
(LN.) <i>List</i>	-0.017*** (0.006)	-0.018*** (0.006)	-0.019*** (0.006)	-0.022*** (0.007)	-0.019*** (0.007)	-0.015** (0.007)
(LN.) <i>Platform</i>	0.115 (0.078)	0.115 (0.078)	0.096 (0.078)	0.083 (0.081)	0.065 (0.084)	0.055 (0.087)
(LN.) <i>ROA</i>	0.691*** (0.128)	0.689*** (0.133)	0.716*** (0.133)	0.845*** (0.285)	0.811** (0.367)	0.763*** (0.290)
(LN.) <i>Aturn</i>	0.061 (0.056)	0.040 (0.057)	0.092* (0.056)	0.151** (0.061)	0.122* (0.066)	0.110 (0.070)
(LN.) <i>Leverage</i>	-1.168*** (0.160)	-1.132*** (0.158)	-1.150*** (0.158)	-0.880*** (0.308)	-0.829** (0.323)	-0.845** (0.349)
(LN.) <i>FSR</i>	1.463*** (0.216)	1.402*** (0.216)	1.375*** (0.216)	1.415*** (0.220)	1.699*** (0.230)	1.933*** (0.244)
(LN.) <i>Ownership</i>	0.156** (0.063)	0.155** (0.063)	0.140** (0.063)	0.150** (0.069)	0.178** (0.071)	0.165** (0.074)
(LN.) <i>Opinion</i>	0.311 (0.229)	0.313 (0.231)	0.386* (0.229)	0.393 (0.261)	0.391 (0.269)	0.510* (0.287)
(LN.) <i>Fee</i>	0.916*** (0.236)	0.925*** (0.238)	0.899*** (0.238)	0.644** (0.251)	0.845*** (0.254)	0.956*** (0.260)
_cons	-29.353*** (1.057)	-28.897*** (1.059)	-29.362*** (1.053)	-27.956*** (1.069)	-28.479*** (1.156)	-28.825*** (1.268)
Year/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18980	18980	18980	16889	14911	13170
Pseudo R ²	0.291	0.286	0.291	0.268	0.268	0.268

注:***、**、*分别代表1%、5%与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各控制变量前的(LN.)表示在动态效应检验中,当自变量*Digit_Wash*进行滞后回归时控制变量群组进行相应期数的滞后处理(N=1,2,3)。列(1)至列(3)样本量减少至18980,是由于在应用Logit回归时在样本期内审计师状态不变的观测个体将不会进入到估计中^[37],而从列(4)至列(6)样本量递减则是由于对变量进行了不同期数的滞后处理,下表同。

的平衡关系,且这一影响效应将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客户与审计师之间向下的不匹配关系上。

表4 企业数字化粉饰对审计师选择错配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i>Mismatch_Down</i>	<i>Mismatch_Down</i>	<i>Mismatch_Down</i>	<i>Mismatch_Down</i>	<i>Mismatch_Up</i>	<i>Mismatch_Up</i>	<i>Mismatch_Up</i>	<i>Mismatch_Up</i>
<i>Digit_Wash</i>	0.042 (0.056)				-0.166*** (0.024)			
<i>L1. Digit_Wash</i>		0.070 (0.059)				-0.172*** (0.025)		
<i>L2. Digit_Wash</i>			0.110* (0.061)				-0.152*** (0.026)	
<i>L3. Digit_Wash</i>				0.179*** (0.065)				-0.162*** (0.029)
<i>_cons</i>	-37.917*** (2.042)	-36.581*** (1.984)	-37.178*** (2.071)	-36.978*** (2.165)	-17.469*** (0.978)	-17.396*** (0.981)	-18.457*** (0.978)	-16.908*** (0.980)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Observations</i>	14566	14566	12922	11448	15234	15234	13504	10403
(Pseudo)R ²	0.431	0.416	0.421	0.427	0.120	0.119	0.133	0.106

为进一步检验企业数字化粉饰与审计师选择上的“向下的不匹配关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参考王嘉鑫等^[39]的做法,基于Gul等^[40]的模型,计算审计意见激进度(*ARAgg*)——即审计师实际发表审计意见与应当发表审计意见的偏离度衡量审计质量。以该值为因变量代入模型(1),所得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粉饰与审计意见激进度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因数字化粉饰而在审计师选择上采取向下匹配策略,这虽然可能带来审计意见的可控但却是以牺牲审计质量为代价的,进而可能导致审计功能的消解和审计行业的不景气^[38]。

为进一步探索数字化粉饰企业选择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动因机制,本文根据企业是否聘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将样本划分为两组子样本,检验结果分别如表5列(2)和列(3)所示。结果显示,聘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数字化粉饰对审计激进度的影响不显著;聘用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数字化粉饰程度越高则审计意见激进度显著越高。鉴于本研究中审计意见激进度 *ARAgg* 实质体现了“趋向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正向偏离程度^[40],由上述结果可推断当企业采取数字化粉饰策略时,相较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聘用更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将更会得到积极、理想甚至超出实际的审计意见。这可能是数字化转型中采取粉饰策略的企业倾向于聘用小规模审计师的重要动机。

(四)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关键变量

第一,替换高质量审计师的测量指标为 *Auditor_Big*,即公司选聘的审计师在统计当年度为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时赋值为1,否则为0。将 *Auditor_Big* 作为因变量重新代入模型(1)进行检验(结果未列示,备索)。第二,参考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的做法^[9],将自变量替换为对数化的数字化相关关键词词频数量,替换关键变量后得到结果与本文结论保持一致。

2. 剔除特殊观察值

第一,以信息技术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其数字化水平与其他企业有较大差异^[9]。为消除数字化相关行业的影响,剔除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电信和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等行业观察值。第二,为消除企业年报信息披露整体质量的固有影响^[9],剔除在沪深交易所信息披露考核中被评级为C(合格)、D(不合格)两个级别的企业样本。第三,为消除新冠疫情的外生冲击^[6],剔除2020年和2021年样本观测值,采用截至2019年的样本重新进行检验。结果(未列示,备索)显示,剔除特殊观察值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5 数字化漂洗与审计质量

变量	所有样本	国际“四大”	非国际“四大”
	(1)	(2)	(3)
	<i>ARAgg</i>	<i>ARAgg</i>	<i>ARAgg</i>
<i>Digit_Wash</i>	0.008*** (0.001)	-0.002 (0.004)	0.009*** (0.001)
<i>_cons</i>	0.063** (0.029)	-0.063 (0.095)	0.078** (0.034)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i>Observations</i>	19512	1587	17925
R ²	0.007	0.073	0.008

3. 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

为缓解潜在的样本自选择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重新筛选样本。将高于数字化粉饰变量均值的企业作为处理组,低于均值的企业作为对照组,以所有控制变量为配对变量、按照最近邻匹配方法对样本进行 1:1 匹配,匹配后所有相关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小于 10%、控制变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且 *ATT* 估计结果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匹配结果良好。基于 PSM 匹配后样本的回归结果(未列示,备案),数字化粉饰变量系数依然在 1% 的水平上与选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变量负相关。

4. 对内生性问题的进一步处理

为进一步缓解潜在的互为因果这一内生性问题,参考董明晴和张嘉伟^[17]等的做法,本文以企业所在行业的数字化粉饰程度的年度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检验中,弱工具变量检验 *AR* 统计量为 6.78 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而外生性检验 *Wald* 统计量为 6.11 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未列示,备案)。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粉饰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与本文基准回归中的结论保持一致。

六、进一步分析

(一) 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数字化粉饰与审计师选择

内部控制水平是影响管理层决策的重要因素^[8]。一方面,内部控制系统更完善的企业往往内部监督机制更完备,能够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和短期私利性投机,并激励管理层更多关注能够获取未来长期增长潜力的战略性投资^[41],从而更能推进企业迈向实质性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内控水平更高的企业不仅具备更加全面和细致的风险评估程序,而且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可靠性要求也相对更高,因此倾向于选聘高质量审计师进行信息鉴证^[8]。亦即内控水平较高企业的审计师选择结果可能更少受到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影响。为验证这一调节影响,本文使用迪博数据库中内部控制指数衡量公司内控水平,构建数字化粉饰与内部控制数的交互项(*Digit_Wash* × *DIB*),代入模型(1)进行检验,所得结果如表 6 第(1)列所示。可见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内部控制水平弱化了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与高质量审计师选择的负向关系,即相较于高内部控制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越低的企业在采取数字化粉饰策略时越会选择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二) 行业竞争环境、企业数字化粉饰与审计师选择

作为一种激励或约束机制,行业竞争环境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投资模式选择与内部治理决策^[42]以及相应的数字化转型策略与外部审计选择。行业竞争程度越高,行业的平均利润越低、企业利润波动性越大^[43],且面临越严峻的经营风险和生存压力^[6],因此企业往往采取低成本或更为保守的经营管理策略。在这种行业环境下,当企业采取数字化转型粉饰策略时,更会选择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以增加审计合约操作空间,避免信息操纵行为被揭露,从而降低声誉制裁所带来的多重经营风险^[44]。基于此,我们预期行业竞争会增强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之间的负向关系。借鉴刘斌等^[6]的研究,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衡量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赫芬达尔指数越高、*HHI* 取值越大,表明垄断程度越高、行业竞争强度越低。本文构建交互项 *Digit_Wash* × *HHI* 并代入模型(1)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6 列(2)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行业垄断程度削弱了企业数字化粉饰与审计师选择的负向关系;即行业竞争越激烈,则当企业采取数字化粉饰策略时,越倾向于选择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

(三) “智慧城市”试点、企业数字化粉饰与审计师选择

企业所在地被列为住建部“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其审计师选择策略产生显著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列入试点后,该城市政府将推出一系列相关财政支持和政策安排以确保完成试点建设考核任

表 6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i>Auditor</i>	<i>Auditor</i>	<i>Auditor</i>
<i>Digit_Wash</i>	0.197 (0.203)	-0.133 *** (0.033)	-0.211 *** (0.029)
<i>Digit_Wash</i> × <i>DIB</i>	-0.001 ** (0.001)		
<i>Digit_Wash</i> × <i>HHI</i>	-0.151 ** (0.087)		
<i>Digit_Wash</i> × <i>SmartCity</i>	0.079 ** (0.047)		
<i>_cons</i>	-27.847 *** (1.124)	-27.725 *** (1.046)	-27.707 *** (0.896)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i>Observations</i>	15797	16889	18815
<i>PseudoR</i> ²	0.274	0.268	0.261

注:限于篇幅,用于构建交互项的公司销售收入 *Income*、迪博内控指数 *DIB*、行业竞争强度 *HHI* 以及智慧城市试点 *SmartCity* 等变量结果省略。

务,企业也会有更强的粉饰动机以展现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遵从形象,以争取更多政府补贴、优惠政策与商业机遇^[45];另一方面,数字化粉饰企业为巩固和拓展政治合法性及政府政策青睐,更会选聘本地小所来遮掩信息操纵与包装粉饰行为、降低声誉损失风险。从而,所在城市被列入“智慧城市”试点将强化企业数字化粉饰与审计师选择的负向关系。为检验这一影响效应,本文根据企业所在城市是否被列入住建部第三批“智慧城市”试点(2012—2014年),设定虚拟变量 *SmartCity* 并进行 0-1 赋值,构建数字化粉饰与试点虚拟变量交互项(*Digit_Wash* × *SmartCity*),代入模型(1)进行检验,所得结果如表 6 列(3)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强化了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与审计师选择的负向关系,即当企业所在地列入“智慧城市”试点,则当企业采取数字化粉饰策略时,会选择更小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2008—2021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在推进数字化转型中“言”“行”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多言寡行”粉饰策略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与高质量审计师选择呈显著负向关系,且这一影响具有长期效应;该效应在数字化转型中采取粉饰策略的公司与审计师之间呈现出的向下不匹配关系中得到验证。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数字化转型中采取粉饰策略的公司,通过选择审计师时的向下匹配机制从而获得审计意见的正向偏离,这是这类企业倾向于聘用小规模审计师的重要动机。进一步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粉饰策略与高质量审计师选择的负相关关系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行业竞争程度更高以及所在地被列入“智慧城市”试点的企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1)对企业而言,在数字化转型中采取“多言寡行”的粉饰策略并选聘较小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这在降低数字化粉饰潜在的信息风险和声誉损失风险的同时以牺牲高质量审计师的财务审查、风险评估及信息鉴证等功能为代价,长期来看不利于企业稳健财务管理和数字化转型风险规避。因此企业应着力推进数字化实质转型,并协同高质量审计师预防和解决转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诸种财务管理与内部治理相关问题。(2)对审计机构而言,应充分结合和利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要求、技术路径、实践特征与组织需求,提升数字资源财会统计与信息披露的审计与鉴证能力,特别是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更要提升对复杂审计业务的执业能力和对信息披露操纵的鉴证能力,客观、独立地出具审计意见。(3)对地方政府而言,在大力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强化财政及政策支持的同时,还要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只停留于宏观规划、始终缺乏实际行动的企业的甄别能力,避免专项补助资源的浪费或低效配置。(4)对监管部门来说,本文结论进一步凸显在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中,推进信息数据资产资源信息披露相关会计、审计准则规范等制度建设的必要性,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审计师工作开展的成效和质量,而且有助于推进全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李哲,王文翰,王遥. 企业环境责任表现与政府补贴获取——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J]. 财经研究,2022(2):78-92.
- [2]罗党论,唐清泉. 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2009(7):84-96.
- [3]邓博夫,陶存杰,吉利.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缓解融资约束[J]. 财经研究,2020(12):138-151.
- [4]Lyon T P, Maxwell J W. Greenwash: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under threat of audit[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2011, 20(1):3-41.
- [5]马鹏飞,魏志华.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现金股利政策:“信息面”还是“资金面”? [J]. 南开管理评论,2023(3):50-60.
- [6]刘斌,汪川琳.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选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69-81.
- [7]张俊瑞,危雁麟,尹兴强,等. 企业数字资源信息披露影响审计收费吗? ——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2023(3):60-71.
- [8]陈小运,陈娟,黄婉. 社交媒体信息披露如何影响审计师选择? ——基于公司新浪微博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3(5):23-32.
- [9]高翀,石昕,刘峰.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决策[J]. 管理科学,2023(3):116-129.
- [10]张永坤,李小波,邢铭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定价[J]. 审计研究,2021(3):62-71.
- [11]陈剑,黄朔,刘运辉. 从赋能到使能:数字化环境下的企业运营管理[J]. 管理世界,2020(2):117-128.
- [12]Warren J D, Moffitt K C, Byrnes P. How big data will change accounting[J]. Accounting Horizons, 2015, 29(2):397-407.
- [13]吴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晓怡.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21(7):130-144+10.
- [14]袁淳,肖土盛,耿春晓,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J]. 中国工业经济,2021(9):137-155.
- [15]高雨辰,万滢霖,张思. 企业数字化、政府补贴与企业对外负债融资——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J]. 管理评论,2021(11):106-120.

- [16] 林斌,饶静. 上市公司为什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J]. 会计研究,2009(2):45-52.
- [17] 董明晴,张嘉伟. 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信息披露行为——信息传递还是印象管理[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10):113-126.
- [18] 黄灿,王妙媛. 信息披露违规对审计费用的影响[J]. 证券市场导报,2022(2):56-66.
- [19] 王雄元. 自愿性信息披露:信息租金与管制[J]. 会计研究,2005(4):25-29+94.
- [20] Francis J R, Yu M D. Big 4 office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9,84(5):1521-1552.
- [21] Behn B K, Choi J H, Kang T. Audit quality and properties of analyst earnings forecas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83(2):327-349.
- [22] 赵玲,黄昊. 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与审计师选择[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2(5):33-42.
- [23] Wang Q, Wong T J, Xia L. State ownership,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auditor choice: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8,46(1):112-134.
- [24] Titman S, Trueman B.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the valuation of new issu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6,8(2):159-172.
- [25] 张敏. 大数据审计:五大趋势与五大挑战[J]. 会计之友,2020(8):2-11.
- [26] Appelbaum D, Kogan A, Vasarhelyi M A. Big data and analytics in the modern audit engagement: Research need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2017,36(4):1-27.
- [27] 黄溶冰. 企业漂绿行为影响审计师决策吗? [J]. 审计研究,2020(3):57-67.
- [28] Johnson W C, Xie W, Yi S. Corporate fraud and the value of reputations in the product market[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4,25(6):16-39.
- [29] 刘星,陈西婵. 证监会处罚、分析师跟踪与公司银行债务融资——来自信息披露违规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2018(1):60-67.
- [30] Armour J L, Fang X, Polo A. Regulatory sanctions and reputational damage in financial marke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17,52(4):1429-1448.
- [31] 马勇,王满,马影,等. 非国有大股东影响国企审计师选择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2):19-30.
- [32] 陈娇娇,方红星. 审计关系错配、盈余质量与整合审计收费[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1):24-32.
- [33] 董雪雁,崔倚菁,高靖宇. 公司战略差异度与审计师选择[J]. 会计研究,2021(6):144-158.
- [34] 漆江娜,陈慧霖,张阳. 事务所规模·品牌·价格与审计质量——国际“四大”中国审计市场收费与质量研究[J]. 审计研究,2004(3):59-65.
- [35] Zhang D. Subsidy expiration and greenwashing decision: Is there a role of bankruptcy risk? [J]. Energy Economics,2023,118:106530.
- [36] Hu X, Hua R, Liu Q, Wang C. The green fog: Environmental rating disagreement and corporate greenwashing[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2023,78:101952.
- [37] 吴贾,姚先国,张俊森. 城乡户籍歧视是否趋于止步——来自改革进程中的经验证据:1989—2011[J]. 经济研究,2015(11):148-60.
- [38] 董冲武,程璐,乔凯. 客户关系是否影响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J]. 管理世界,2018(8):143-153.
- [39] 王嘉鑫,赵牧,黄翔,等. 复杂供应链网络风险识别下的审计质量研究——基于全球断供冲击的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3(5):11-22.
- [40] Gul F A, Wu D, Yang Z. Do individual auditors affect audit quality? Evidence from archival data[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13,88(6):1993-2023.
- [41] Wang W, Wang H, Wu J. Mixed ownership reform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of Chinese listed firms[J]. 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2021,69,101648.
- [42] 邢立全,陈汉文. 产品市场竞争、竞争地位与审计收费——基于代理成本与经营风险的双重考量[J]. 审计研究,2013(3):50-58.
- [43] Cai H B, Liu Q.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9,119(17):764-795.
- [44] 徐玉德,韩彬. 市场竞争地位、行业竞争与内控审计师选择——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2017(1):88-97.
- [45] 赖晓冰,岳书敬. 智慧城市试点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22(10):117-133.

[责任编辑:刘 茜]

Corporate Digital Whitewash Strategies and Auditor Selection

ZHANG Zhenbo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often difficult to achieve overnight, and some companies may adopt digital whitewashing strategies to achieve low-cost reputation construction and image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21,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s whitewashing strategy on auditor selection is empirically examined. It is found that firms' digital whitewashing strategy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high-quality auditor selection, and this effect has a long-term effect. Mechanism tests indicate that the downward matching mechanism in selecting and hiring auditors and thus obtaining a positive bias in audit opinions is an important motivation for firms adopting whitewashing strategie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prefer hiring smaller auditor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 whitewashing strategies on the auditor selection is more pronounced in firms with lower levels of internal control, higher levels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locations that are included in "smart city" pilots.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superficial transformation; disclosure of digital information; image management; digital whitewashing; auditor selection; audit opinion; audit opinion radicalization